

参 考 信 息

江苏理工学院图书馆主办

第 5 期 （总 204 期）

2017 年 5 月 5 日

本期要目

特别关注

科技创新需要“劳逸结合”.....(2)

充分发挥教指委作用 做好思政课教学质量年工作.....(3)

高校焦点

从最强电脑、最强大脑到最强人心，如何调教

“世界上最聪明的人”.....(4)

教育思想

重识大楼之谓与大师之谓.....(6)

时政频道

安不忘危 本固邦宁 习近平总体安全观筑牢国家安全防线.....(10)

科技创新需要“劳逸结合”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我国目前还面临一些瓶颈，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创能力还有较大差距。创新依赖科学家的头脑，而科学家的头脑是最难把握。然而，科技创新还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劳逸结合”就是其中之一。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三境也。’”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来理解和诠释这一段名言，可以说第一境界是高瞻远瞩、选准目标，第二境界是苦心孤诣、废寝忘食，第三境界是豁然开朗、得心应手。这三重境界归纳起来，可以称作“劳逸结合”，因为科技创新成果往往是在“劳”（第一、第二境界）的基础上、在“逸”的状态下（第三境界）得出。与此类似，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霍兹和法国数学家彭加勒认为，科技创新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酝酿阶段，科学家在充分掌握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煞费苦心地探索；第二个阶段是启发阶段，科学家往往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头脑中出现了创意或问题解决方案。例如，古希腊物理学家阿基米德面对给国王金冠称重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但在一次洗澡时，脑中忽然出现了解法。又如，德国化学家凯库勒受梦境的启示，发现了苯分子的环状结构。阿基米德在洗澡时的灵感和凯库勒的梦境，都是在极度辛劳后头脑放松的时候出现的。

科技创新中的“逸”并不是放弃研究或耽于享乐，而是经过一些放松时刻，使头脑摆脱种种成见的束缚。要想经过“山重水复疑无路”的艰辛积累，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畅快顿悟，往往需要突破思维定势。美国细胞生物学家德汉说，先入之见是创造性的祸害。因为这些先入之见会让人一下子跳到某个结论，难以打开新的局面。摆脱先入之见的办法是让头脑放松、让思维自由游荡，充分发挥想象力，实现“思维变轨”，将本来不相干的东西联系起来。美国化学家赫希巴赫说，在创新时，你在探索一个我们没有答案的问题，这是挑战、是冒险。这时需要的不是将脑子集中在某一点上，而是让它漫游、游荡；可以做一些与研究无关的事，例如去森林散步，让头脑去它不熟悉的领域逛逛。他说，正因为你不在这个不熟悉的领域是新手，这种幼稚、天真和质朴往往能让你萌生创造性的顿悟。赫希巴赫本人运用联想思维，把本来不相干的东西联系起来，用

交叉分子束方法研究化学反应，设计了“分子束碰撞器”和“离子束碰撞器”。这些成就使他获得了诺贝尔奖。

科技创新中的“劳逸结合”，还意味着百忙之中要下一着闲棋。在很多棋局中，有些落子看似闲棋，其实不闲，是对主要棋步的长线配合，是棋手的主动布局，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会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一些基础研究就像科学创新中的闲棋。基础研究孕育着创新的潜能，但我们不知道基础研究成果何时可以转化为生产力。当年，英国首相访问法拉第的实验室，法拉第向他展示电磁感应现象，首相问他：“这有什么用？”法拉第反问道：“那你说小孩儿有什么用？”众所周知，似乎离实际生活很远的电磁感应理论，后来被广泛应用于电工、电子技术、电气化、自动化等诸多领域，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个故事启发我们，要大力支持基础研究。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要有远见。让一部分科学家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其意义、其作用从长远来看，是很重要的。这些论述在今天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摘自：人民日报 2017-04-24）

充分发挥教指委作用 做好思政课教学质量年工作

2017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年度工作会议于4月27日在京举行。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杜占元出席会议并讲话。

经教育部党组研究，决定将2017年定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年”。教育部党组专门研究并审议通过了“2017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年专项工作总体方案”，对质量年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为做好质量年各项工作，教指委和各地教育部门要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打赢提升思政课质量和水平的攻坚战，提升思政课教学亲和力和针对性，切实增强大学生对思政课的获得感。一是要深入一线听一批思政课，二是要注重示范培育一批品牌课，三是要加强培训打造一批好老师，四是要认真研究形成一批高水平成果。各地各高校要全面落实思政课教学质量年工作的主体责任，积极研制实施本地本校专项工作方案，配合做好专家听课指导等工作，以实际行动推动高校思政课在改进中加强，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迈上新台阶。

会议强调，今年将组织教指委所有专家分赴全国2596所普通高校听3000堂思政课。教指委专家和各地教育部门要通过调研摸清情况，开展面对面的指导，为教育部科学决

策提供优质的智力支撑。教指委要遴选和组织一批优秀教师围绕教学中的重点难点制作示范课，供师生参考学习，提高优质教学资源的使用效率。教指委专家要对每门课程教师队伍和教学中存在的困难问题进行梳理，与教育部和各地教育部门共同研究培训课程设置，实现精准培训，有效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教指委专家要开展前瞻性研究，有计划地开展主动研究，特别要组织、带领思政课教师开展相关问题研究。

（摘自：中国教育报 2017-04-27）

从最强电脑、最强大脑到最强人心，如何调教 “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最近高等教育界流行一段话：有德有才是精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德无才是废品，无德有才是危险品。

ACM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大赛，参赛队伍遍及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加州理工等世界一流名校，被称为“世界上最聪明人的比赛”。作为 ACM 队“总教头”，上海交大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俞勇教授，20 多年来率队 6 度斩获大赛金牌、3 次将全球总冠军带回中国。在这位全国师德标兵眼中，如何调教这些校园里“最聪明的人”，远不止一个育才问题，更不是送上领奖台即可，而首先是一个育人问题。

一顿晚饭，引发教育观更新

有一次，俞勇率队赴我国台湾参赛，当时必须途经香港换取“入台证”，因转机航班不顺，整整一天舟车劳顿，到晚饭时师生们都已饥肠辘辘。好不容易围坐用餐，一道道菜式上桌，只见有学生每每将旋转台面转到自己跟前，大吃特吃，毫无顾忌。

俞勇当即善意指正。学生的回答令他吃惊：老师，从小到大都没人告诉我不可以这样做。“错，也许不在他们。”俞勇说，前辈经历了太长年代的挣扎与期待，寄望于下一代的东西太多、太沉，于是学生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完成长辈意愿，而长辈意愿往往只要求孩子考上理想大学——只注意学习成绩，而忽略品行和人格教育，最终虽然考上“理想”大学，却未必能实现远大“理想”。

从那顿饭开始，俞勇这个“上海市教学名师”也大幅更新了教育观。头脑和电脑不

是全部，“老师也是‘学生’，知己知彼、读懂他们才能做真正的老师。”如今，ACM班从课程设置到培养模式根本不涉及竞赛内容，而是从“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培养，“竞赛”只是变为一种检验。“事实上，在背后支撑知识和能力的力量必须更加强大。”

一对一面谈，眼光最“毒”也最“独”

学生们都说，俞教头的眼睛很“毒”，有事总瞒不住他；眼光也最“独”，特别注重个性化教育和引导。同时，学生还觉得和他没有“代沟”，什么事都可交流。对此，俞勇甘愿苦口婆心做保姆，“不观察他们，不了解他们，说出来的话和他们想的不沾边，怎么把他们教好呢？”

与入学一一面试差不多，俞勇至今保持着少有老师做得到的习惯：每年暑假初的小学期都要花差不多两周时间，与班上每个学生一对一面谈一次，从早到晚，定时定点，可谈优点，更谈不足。这学期，两个班48人，也都将一一面聊。

如今的女学霸小罗也正是大一时那次面谈，改变了她的人生走向。在中学原本数一数二，到大学“倒数”过来，甚至出现不及格，她愁眉苦脸“咋不会读书了呢”，甚至提出离开特班的想法。

俞勇还记得那顿抢菜吃的晚饭，“我们的孩子，在中学时是竞争关系，但大学里应该是团队关系。”俞勇告诉她，解不出、做错了的题，不能不告诉同学们，默默压抑会恶性循环；同样，也不是简单地问同学：这题怎么做；而是应该把思考的过程告诉同学，诊断在哪里出了错，这样才是学会分享、互助互利。

第二次面谈，俞勇发现小罗笑颜以对，“我就放心了”。毕业时，女生最终放弃了顶尖名校的录取函，而选择了华盛顿大学图形学专业投身动画，因为她找回了从小的梦想：画画。

你上我评，独一无二“学子论坛”

除了课堂外的育人功夫，课堂上的俞勇也是对一无二。每个新学期伊始，计算机系新生们总是惊讶发现，俞勇给他们上的第一课，居然不是编程，也不是ACM队三度加冕的辉煌。俞勇讲到“黄埔军校”，孙中山先生希望创建革命军，挽救中国危亡。而这个交大办学特区“致远学院”的计算机试点班也是“新黄埔”，只有中国自己的计算机科学家，才能振兴中华、再次崛起。“老黄埔的校训是‘亲密精诚’，而我们的班训是‘携

手·超越’，手拉手一起改变世界。”

令这位全校“最受学生欢迎教师”自豪的，还不是第一课，而是在全院四年本科总结评教时永远前三、印象最好的一门课：“学子论坛”。这门课无关计算机，大一大二4个学期各开一次，主讲是每一个学生，俞勇则是随堂做着听写笔记的“点评专家”。从天文、地理、史学、文学、体育、时政到经济，从选择题材、内容收集组织、上台演讲、提问讨论到互评成绩，全是学生“自编自导自演”。

最近一次“学子论坛”，有学生抛出褒贬不一的曾国藩人物话题，俞勇从正面循循善诱，不放大阴暗面，“可以学学他屡败屡战，不怕输不认输”。一位学生这样评价：“这一切对话，不过是发生在一间小小的教室，但讲的人也好，听的人也好，大家都早已飞到了很远的地方。”

俞勇尊重所有的人，也要求学生尊重身边所有的人。他常常告诫学生一句话：打扫卫生的阿姨也许和你的成败有关。每次带队到世界各地比赛，都有曾经的队员自费到赛场给他们加油；平时训练中，更有已经毕业的老队员从世界各地邮来资料；而后来的一届届学生，只要亮出 ACM 班“名片”，联系上各地学兄学姐，哪怕只是电邮，从未谋面的学长都是有求必应、绝对帮忙。这就是 ACM 班的人心所向，也是俞勇的师格魅力。

（摘自：解放日报 2017-04-27）

重识大楼之谓与大师之谓

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在就职典礼上讲了一句名垂千古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从此之后，大学建设若强调人才之重要，必冠冕堂皇引之；若再谈大楼之谓，便似乎矮了三分，底气严重不足。加上“非”“有”更似强调非此即彼的关系，令今人常易生误读，以为大学之大，纯靠大师，与大楼无关。于是现在无论是政府还是大学，都常有一种错觉：办大学，我们大楼的条件已经足够了。甚至如今很多地方投入巨资推动“双一流”建设，大都规定经费大部分用于人才引进，基本不能用于基建、设备等用途。因此，颇有必要重识大楼之谓与大师之谓的关系，以对当下一些误入歧途的办学实践起到一定的匡正之功。

不可割裂来看大楼之谓与大师之谓

今人易对梅贻琦的话有所误读，乃在于不了解当时此话的背景。1930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的前一年，前任校长罗家伦已委托清华校友杨廷宝所领导的基泰工程司主持了清华的规划，建成了生物馆、气象台、明斋和图书馆二期，被称作“又一四大建筑”，且和清华原有建筑一样，采用西洋古典建筑的布局，恢宏大气而又有象牙塔之风。梅贻琦回国担任校长时，大楼已成，且经费充足，又面临着当时国家政治中心南移而导致的人才激烈竞争。因此，他认为学校经费更多应投向延揽人才，才有“大师之谓”之说。

在梅贻琦当日的演说中，讲“大师之谓”之前还有一段话。原话是：“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因此，梅贻琦实质上是将大楼和大师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的，只是为了防止当时清华校园大兴土木之风的思想蔓延，更加强调人才之难得。而且，所谓“大楼”，不仅指的是建筑，还应包括仪器和设备等，是大学办学硬件的泛指。

而且，从历史实践来看，梅贻琦也并非不重“大楼”建设。他发表演说当年，便委托天津华信工程司的沈理源先生开展清华园的建设和规划，在延揽“大师”和建设“大楼”上是齐头并进的。沈理源被称为中国现代建筑开山鼻祖，也是大师级的人物，当时清华化学馆、机械馆、航空馆和静斋宿舍楼等建筑都出自其手。当然，这些建筑风格的背后也显然有着梅校长“大楼”理念的影子——风格朴实谦和，立面简洁去装饰，融合了新古典主义风格和现代主义建筑的思想，其后也成清华老建筑之经典。

追溯历史，其实当时清华正是因为充分发挥了“大楼之谓”的优势，延揽了很多“大师”：当时清华校园建筑和设备基础非常好，包括庚子赔款在内的资金支持可以带来优厚待遇，再加上当时的人才流动性也比较好，所以在梅贻琦任校长期间，引进了当时的很多知名学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清华园，既有大楼之基，又得大师云集，可谓清华校史上的黄金时期。

重新审视身处现代性之中的大楼和大师

如今离梅贻琦执掌清华之时已将近百年，尤其是随着现代性的不断冲击和改造，我们必须对“大楼之谓”与“大师之谓”重新予以时间维度的审视。

梅贻琦发表这篇经典演讲的年代，正是中国现代性浮现并开始涨潮的年代。其标志性的背景即是之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无比热情地拥抱象征启蒙的“科学”和“民主”。彼时的现代性焦虑，是中西文化冲突之间的焦虑。尽管当时时局不稳，但在中国的知识界，很少有经济焦虑。尤其是作为精英高等教育年代的大学教授，普遍享有较好的薪水待遇，基本可以做到“读书不为稻粱谋”。

但是，将近一百年后的今天，大学教师所面对的内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内部环境上，高等教育早从以往的精英时代转入大众化时代，而且即将进入普及化时代。大学教师也从象征着象牙塔的知识精英，转向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的一种大众化职业身份。大学教师群体的数量也大量膨胀，其精英色彩更趋消退。而同时，在外部环境上，如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所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处于一个不断现代化的社会转型历程，长期的转型使得现代性焦虑更加突出。尤其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国人对于物质生活的感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普遍附着了更多的“经济人”特征。最典型的就是房价问题：如今中国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房价畸高，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的房价，让收入最多跻身于中产阶级层次的大学老师常只能望房兴叹，更别说刚刚博士毕业的“青椒”，而这些一线城市又恰恰是集中了最多大学的城市。因此，这个时代大学教师的现代性焦虑早就从文化焦虑变成了一种经济焦虑，这种经济焦虑与一般城市中产阶级的焦虑毫无二致。

因此，当我们讨论“大楼”与“大师”，必须置于现代性背景之下进行考量，而非一味缅怀过去。现代性的典型特征是全球化、多元化与扁平化，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写道：互联网等新的信息科技，产生全球化的新的趋平化时代。大楼所象征的硬件条件，在百年前的清华不成为问题，而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却成为一个时代命题。如今已经进入一个需求多元的年代，大楼不再是少部分人的权利，而是大部分普通人的需求甚至刚需。在需求范围更广泛和需求层次更高的今天，“大楼”还将长期作为大学办学中一个重点问题存在，而且问题的程度因区域、校情不同而不同。而包括住房在内的“大楼”条件的改善，正是化解当前大学教师的现代性焦虑的一个重要路径，也是让这个群体平心静气做学问，产生未来“大师”的一个必要条件。此外，也需要用现代性逻辑重新理解“大师”：如今不少学者的学术水准若作直接比较，可以说超越了民国的

很多大师，但是人们总吝于冠之以“大师”之称号。为什么？由于互联网时代所带来的信息爆炸，每个人的学术贡献和思想言说都是速朽的。显然，在如今专业主义盛行的年代，将“大师”理解为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可能更为务实可行。

如何通过空间的改善来涵养大师

①是在空间资本化的背景下增加人才的空间资本

现代性之下的“大楼”，是资本空间化的后果。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了城市空间生产理论，他研究了空间范畴的演化逻辑，并扬弃了把空间当作场所或容器的僵化观点，认为资本运作模式已经由生产空间中的事物变成生产空间本身。资本创新导致了空间资本化，迎来了全球性的空间生产，其表现形式便是全球性的城市化以及城镇化。而其中最为直接的表现，便是住房的空间资本化，如今的住房除了满足居住需求之外，兼具资产价值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现在福利分房政策一去不复返的时代，有条件的大学最直接的方式是建设廉租房。如今很多大学“青椒”连周转房都没有，已经成为大学延揽人才的一大困境。因此，增加大学教师空间资本的最直接方式，是空间再造，为人才提供基本条件的公租房，为其安心教学科研提供基本保障。有些地区或学校限于条件，也许难以提供足够公租房，则可以采取间接方式——发放货币补贴。发放货币补贴的一般做法在很多地区和大学都有实行，但其额度相对稳定而且偏低，很难跟得上房价市场发展的步伐。这需要有条件的地区和大学做出更具有针对性的应对，比如广东省在 2017 年初出台的《关于我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中，采取直接发放人才补贴的方式，彰显力度和创新——省级财政对新引进国内外顶尖人才发放 150 万到 350 万的购房补贴，还加大实施广东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的支持力度，对入选者每人发放 50 万到 120 万元的生活补贴。在新的经济发展背景下，尤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的思维和人才观的转变。在以往人才观里，谈“名”似乎还比较理所当然，但谈“利”便似乎不好意思。但事实上，科研人员也与普通人一样，安居才能乐业，只有给其创造在如今空间资本化下起码不至于连生存都举步维艰的环境，才能有更多的心思投入到学术科研中去，创造更大价值。

②是通过空间文化的建设来涵养大师

未来“大楼”之努力方向，乃在于空间文化的建设。

一方面，通过校园建筑的空间文化来涵养“大师”。北方的清华、北大，南方的厦大和中大，都有着古典并富有中国传统韵味的建筑群，亭台楼榭，古树参天，都体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空间文化。而这些大学长期以来人才辈出，大师延续不断，可见，“大楼”与“大师”从来都是相得益彰的。朱永新先生曾经描述过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他认为研究院贯彻了冯骥才“把大自然请进校园”的理想：院内建筑利用空间、环境、结构、材料及光影的独特处理，强化了现代审美与传统意境的融汇，表达了研究院的文学气质与文化情怀。他由衷感叹研究院正是通过空间文化的探索将当代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引进大学的成功案例。笔者所供职的大学，前段时间对图书馆进行了空间改造，侧重打造知识共享空间功能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受到师生热捧。整个改造花费不过三百万元，也许还不声不响地融入了校园文化，成为校园建筑文化的一个缩影。

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引领，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到全面实施国家安全法，从系统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到确定每年4月15日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被列为头等大事稳步推进。

2013年11月12日，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2015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安全战略纲要》。

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29号主席令予以公布。《国家安全法》对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等11个领域的国家安全任务进行了明确，共七章84条，自2015年7月1日起施行。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筑牢国家安全屏障

走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政治安全为根本，经济安全为基础。

人民安全和政治安全紧密相关，核心要义都在于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恐怖分子零容忍就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事例之一。2014年3月1日，10余名统一着装的暴徒蒙面持刀在云南昆明火车站广场、售票厅等处砍杀无辜群众。对此，习近平掷地有声地表示，以坚决态度、有力措施，严厉打击各种暴力恐怖犯罪活动，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伤害无辜群众就是触碰底线。”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健全预防和化解经济安全风险的制度机制，保障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产业、重大基础设施和重大建设项目以及其他重大经济利益安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个人的国际交往日益频繁，使得个人在国家安全中的

分量日益增加。近年来，生物入侵、网络间谍、个人泄密等事情屡见不鲜，足以显示个人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主体。

尤其是网络安全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时提出：“要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加快构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全天候全方位感知网络安全态势，增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和威慑能力。”

当前，网络安全问题早已超出了技术安全、系统保护的范畴，发展成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各个领域的综合安全，越来越多地与外交、贸易、个人隐私和权益等交织在一起，涉及政府、企业、个人等各个方面。提高网络安全意识，既是维护个人安全，也是维护国家安全。

此外，大量事实表明，在走出国门的中国人越来越多的今天，党和政府也越来越重视我国国民的海外安全问题。前些年，日本核泄露事件、利比亚内战、叙利亚危机中的撤侨、以及马航MH370等事件中，国家不仅在每次重大事件发生时都及时采取了必要的救援措施，而且还在外交、公安、军队等部门成立了相应的专门机构。

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 打造命运共同体

“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身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2016年3月31日至4月1日，习近平出席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四届核安全峰会。“安全”成为他在多边和双边场合一系列谈话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关键词。他提出的理念、倡议和方案对各领域国际安全事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体现了中国对全球安全治理的大国担当。

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习近平强调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倡导新亚洲安全观。安全不是你死我活，而是求同存异。以邻为壑，往往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亚洲国家是个大家庭，其兴与衰、安与危、治与乱，攸关所有国家的命运，攸关各国人民的福祉。只有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才能实现亚洲的长治久安。包容共赢、命运共同，为全人类作更大贡献，正是“中国梦”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观在国际上的生命力和号召力所在。

（摘自：央视网 2017-04-15）